

· 王 景 山 ·

向同学说

北京师范学院教务处

王景山先生

向同学说

中石家登



1990.10

前 言

在校庆35周年的时候，我们编了这个小册子，作为礼物送给同学们。

作者王景山老师于1946年初登中学讲坛，到我院任教也已33年了。他是十分热爱教育、热爱师范、热爱教师工作的。

前两年他应院刊之邀，写了十几篇长短不一的文章，都是以学生为对象，涉及人生观、精神文明、专业思想、学习方法等方面的，从中不难看出一位老教师对同学的真诚关怀。

他现在除为我院中文系教授外，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并担任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、中国鲁迅研究学会、北京杂文学会的理事。业余常写杂文，以王荆等笔名在国内多家报刊上发表，曾获《羊城晚报》杂文佳作奖和北京十余家报刊联合举办的杂文征文二等奖。

为了这个小册子，著名书法家、教育系欧阳中石老师欣然题写书名，画家、美术系戴克俭老师积极承担封面设计任务，从中同样寄托着这些老师对同学的厚望。

目 录

前言

我的老师.....	(1)
从“打倒考试”说起.....	(5)
春天正是读书天.....	(7)
谈“风”.....	(9)
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.....	(11)
论两种“苦学”.....	(13)
记笔记的甘苦.....	(15)
“乐学”和“学乐”.....	(17)
杂谈“学”和“思”.....	(19)
《百喻经》故事引起的.....	(21)
头疼医脚小议.....	(23)
在火警面前.....	(26)
大学生的风度.....	(28)
忆西南联大(附录).....	(30)
后记.....	(36)

我的老师

人谁无师？

人非生而知之者，都是学然后知的，因此，人不能无师。

“无师自通”，有此一说。但如从来无师，“自通”怕是不易。“自学成才”，只是和学校毕业、科班出身相对而言，绝不是对师的否定。

或问，婴儿时期也有师吗？也有的。生身母便是婴儿最初的师。

进入儿童时代就更不用说了。就以我为例吧，大约四、五岁时家里要让我上学了，在一处私塾里朝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木头牌子磕了头，旁边一位干瘦的冬烘老先生，便成了我的开蒙师。然后，上小学，有小学老师；上中学，有中学老师；上大学，有大学老师。再后，自己又当了中学老师。意想不到的，居然还滥竽充数当上了大学老师，迄今竟已二十又七年。

现在年逾花甲，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，以后就与师无关了么？并不的。有人说：“青年是我师，我是青年友”，我看此言甚是。何况，孔夫子还说过“三人行，必有吾师焉”呢！他老先生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，就是在实践他的理论。

可是，亚圣孟夫子不是又有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之说吗？怎么办呢？自作聪明，目中无人，强不知以为知，胡说

教，瞎指挥，这样的“好为人师”，自然是不好的。但如大家都盲目信奉了这一教条，谁也不做老师，结果一定更糟。

“人之患”也许倒是清除了，接着来的却必然是国家民族之患，千秋万代之患，后患无穷，不堪设想。“停课闹革命”、“大批师道尊严”，前后不过十年。这苦果，不是直到现在大家仍在咀嚼，而且可能还要继续咀嚼一段时间吗？

师在社会上的地位，的确也难以敲定。旧时是曾经把“师”的位置紧排在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君”、“亲”之后，名列第五的。可是旧时偏又有“家有二斗粮，不做小孩王”的说法。解放后，教师被尊为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这就对了，谁知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一起，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各类老师，便纷纷堕入“臭老九”的深渊，在劫难逃，夫复何言！时至今日，报刊上，广播中，还时有打骂教师的消息从各地传来，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流毒未清的表现。即使单从这一点看，也应该认为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刻不容缓。

现在再回到“我的老师”上面来吧。

教过我的老师，可谓多矣，单是知名之士，已经为数不少。不过“名师出高徒”之说，我却不完全相信。初中时期，王大化同志教过我音乐。他后来到延安，成为著名秧歌剧《兄妹开荒》的作者和演员，并是著名歌剧《白毛女》的最初执笔人之一。可是唱歌和演戏，从来就是我的薄弱环节。当时教我美术的是刘艺斯先生。后来读廖静文同志的《徐悲鸿的一生》，才知刘先生是“南国”中人，悲鸿先生的及门弟子。然而我因此就成了画家了么？事实证明没有。大学时代，教我们大一语文的是“五四”新文学前辈杨振声先生，教我们英语发音的是语音学专家袁家骅先生，教我们

翻译的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，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是易卜生研究的权威潘家洵先生，担任我所在的“联大文艺社”的导师的是著名诗人、散文家李广田先生。可是我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创作、英语会话、外文翻译，以及易卜生研究等方面，何尝有一点一滴的成就呢？真是辜负了我的这些位知名恩师了。看来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之说，也许更有道理的吧！

对这些教过我的名师，我是尊敬的，有的还是我终生难忘的，但时时引起我亲切怀念的，却是高中时期教过我的几位并不知名的老师，而且都是女老师。一位是教我们英语的钮先绅老师，一位是教我们数学的杨簾引老师，一位是教我们国文的钱淑仪老师。她们都是严师。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为师不严，便是失职。但她们的严，不是神情严厉之严，而是态度严肃、要求严格、作风严谨之严。当时我们都是些半大孩子，对她们的严，有时是难免有些微词的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龄的增长，才越来越感到从她们的严肃态度、严格要求、严谨作风中，真是得益匪浅，终生受用不尽。现在钱、钮两位老师都已作古，杨老师健在。不管我是在当中学老师或是在当大学老师的时候，不管我是在备课的时候、讲课的时候、辅导的时候、或是课余和同学们交往的时候，这三位老师的面影神情时时闪过我的心头，督促我也鼓舞我踏着她们的足迹，学着她们的榜样，勤勤恳恳、耐心细致、认真负责、亲切而又严格地对待同学，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竭尽绵薄。

中学时代是人生最值得怀念的时代，中学老师也多是一生最值得怀念的老师。我怀念中学时代的我的老师，我也曾作为中学老师而被我的学生怀念。我现在教的学生，他们又

将成为中学老师，若干年后复为他们的学生所深切怀念。
为此我满怀幸福的感情写这篇《我的老师》。

1984年8月21日

从“打倒考试”说起

新学期又开始了。院刊要我随时写点零星感想，以备补白之用。于是我想到上学期末整顿考试纪律时，据说曾出现过“打倒考试”的匿名标语，此事似可一议。便决定由此说起。

学生怕考，大概自古已然，因此早有“秀才怕岁考，叫化子怕狗咬”的说法。然而对考试却又不得不予以重视，否则历代的“青青子衿”们又何必受那“十年寒窗苦”呢？

头些年在学校里流传过这样的话，“考，考，老师的法宝，分儿，分儿，学生的命根儿”。击节赞赏者有之，摇头叹气者亦有之。窃以为，如果老师别无能耐，只会以考为法宝，自属不当。学生以分儿为命根儿，却应一分为二来看，不好一概而论。为分数而学习，不足为训，重视学习成绩的优劣，则无可厚非。

前两年对考试的想法，似乎又有发展，叫作“六十分儿万岁！”混个及格就算功德圆满、完事大吉，对自己的要求实已降到最低限度，但显示出来的，总还是自己的真面目。一到考试作弊，自欺欺人，对人对己都是一片虚伪，那就等而下之，更无足论了。

好的，不准作弊么，我就“打倒考试”！

动不动就喊“打倒”，过去有一时期是颇为盛行的。且不说大活人了，连死人也不能放过。从中国的孔老二，到英国的牛顿，俄国的三个“斯基”，统在“打倒”之列。结果

如何呢，反正这几位是打虽打了，倒则未也。

时至今日，“打倒”的流风余韵，仍然不绝如缕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考试也者，仅是衡量老师教学效果、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一种形式而已，如有未臻完善之处，自可不断改进，你打倒它干什么？莫非一打倒了考试，个人的知识水平、教育程度、文化修养，就变成一笔糊涂帐，也和阿Q的名字一样，无从查考了么。何况，“打倒考试”恐怕亦非易事。

就算有形的考试被打倒了，但还有无形的考试呢，那可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打倒的。而人生在世，走着的正是一条充满无形考试的道路。各种各类的问题，要你回答；各式各样的困难，要你解决，这却又是谁也逃不开、躲不掉的。

于是我想，不要侈谈什么“打倒考试”了吧，现在需要的是，抓紧时间，刻苦努力，求得真才实学，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去通过人生道路上的一切有形无形的考试，这才是正理。

1986年3月1日

春天正是读书天

春天来了。忽然想到旧时的一首打油诗。诗云：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，待得秋来冬又到，收拾书包过新年。”

新年过后呢？自然又是“春天不是读书天”了。这可真是学习懒汉的一幅生动写照。

过去虽然有过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的说法，而且项被称为西楚霸王，刘则成了汉代的开国君主，我却认为不足为训。如果“刘项从来爱读书”，项羽也许不至于被围垓下，演出“别姬”一幕悲剧，刘邦当然更不会闹出拿知识分子的帽子当尿盆的笑话。

我认为，书是要读的，只要可能，还应多读，学海无涯，就算象惠施一样“学富五车”了，也不一定就到了头。

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这一点，正在求学的学生常常不易感到。即使考试临头了吧，怕也是恨自己没猜对题目的居多。真到年华老大，用时恨少时，却又悔之晚矣。

最不好办的是，还有一句“学然后知不足”，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越学，越感到自己的不足；越感到自己的不足，自然又越要学；……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，前进不已。反之，不学，就不感到自己有何不足之处；越感觉不到自己有何不足之处，自然就越不学；……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无知到底。这种两极分化，也是不留任何情面的。

前两年，有过“开卷”是否“有益”的争论。原则上我

同意开卷有益的说法。当然，读书的目的要明确，学习的态度要端正，这是必须坚持的前提。

正在做老师的，将要做老师的，更要多读书。不是说“要给学生一桶水，老师先得有十桶水”吗？这话一点不错。

我听说咱们有些同学颇有点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”的味道：比吃喝，比穿戴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聊大天，睡大觉，精神好时扑克一玩半夜，甚至打牌赌博，一次输赢数十元，终于触犯了校纪国法。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余，真不禁要叹一声：何苦来哉！

西谚曰：Time is money！中谚曰：“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”。浪费了任何别的东西大概都可补偿，能找回来；只有浪费了时间是无法补偿，也找不回来的。

现在学习条件好，肯定不需囊萤、映雪、凿壁偷光了。但悬梁、刺股、负薪、挂角的那种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的精神，我看仍然值得学习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正是读书天。好，现在就开始！

1986年3月14日

谈“风”

人们是关心自然界的风的。

春种秋收，希望五风十雨，风调雨顺。

乘船坐车，总望风平浪静，一路顺风。

夏日在家，最好凉风徐来；冬天出门，却怕寒风凛冽。

现在不少人家，生活改善，购置了冷暖风机，自然方便多了。

约定某日陪远方来客游长城八达岭，欣赏塞外风光，恰好风和日丽，于是人人春风满面。如走到半途，忽然风雨交加，可就大杀风景了。

前些天从电视上看到，连美国那样科技先进的国家，碰到龙卷风似乎也无能为力。联想到我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，就营造起三北防护林带，阻止朔风南下，沙漠东行，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。

自然界的风对人类的影响太大了。怪不得人们在注视或谛听天气预报时，除关心天气阴晴雨雪、气温高低升降外，还要注意风向的东南西北，风力的一二三四五六级。

然而人们也许更关心社会上的风。

早在“五四”时期，就有人蹙额疾首，摇头感叹说：“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”。不过直到今天我也闹不清，莫非人心越古越好，人心都古了，世风才能日上么？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《上帝的宠儿》中，出现了两位穿着旱冰鞋满台飞跑的人物，一名“风言”，一名“风

语”。这两位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搬弄口舌，喊喊嚷嚷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恐怕也正是莫扎特时代不正之风的一表现。

当前人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深恶痛绝，说明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人们的危害，可能还远过于自然界的风灾风害。

现在好了，党中央狠抓端正党风，以期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。

不过我却又觉得，既然世有世风，党有党风，那么校有校风，学有学风，教有教风，以至系有系风，级有级风，班有班风，也应是顺理成章的。从上到下，一级带动一级，自然极好。然而班风好，会形成好的级风；级风好了，会形成好的系风。教风好了，会影响学风；学风好了，也会影响教风。校风又是这诸风的总和。这岂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？

因此，我想提个小小的建议，建议各班级，各系室，以至各处科，都来议一议自己单位的风，研究一下如何形成自己单位的良好风。

虽然过去有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”的提法，我却认为无须等待风行，然后草偃。别的院校，别的系室，别的班级，别的处科，都没这么做，或还未这么做，我们却可率先做起来。这不是出风头，而是要开风气之先！

1986年4月2日

“教不严，师之愆”

《三字经》一书，我在儿时是读过的。一开头便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两句。性恶、性善，这原是荀卿、孟轲这些老先生们带头争论，长期聚讼不休的大问题，对三、五岁的孩子来说，自然颇不易解。但那三个字一句的文体，流畅悦耳的脚韵，背诵起来，却比什么“孟子见梁惠王”、“子曰学而时习之”、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”之类，要容易得多。

于是《三字经》中的一些典故、故事，以至某些历史、文化常识，也就随着当年摇头晃脑的背诵，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我那小小的头脑之中。迄今垂六十年矣，中间并经过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彻底批判，却仍然不“念念”而亦“不忘”，足见“中毒”之深。不过我之一贯主张小学、中学时代多背诵些东西，其原因亦在此。

其实，《三字经》中也并非全是糟粕，其中有些看法和道理，即以今天的要求，也还是可以成立的。例如“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愆”就是。

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，这好象是大家都承认的，当然，儿子犯了罪，不应株连老子。但老子没教育好儿子，自也有一份责任。鲁迅就曾经慨叹于中国人之“只会生，不会教”，因而建议开办“父范学堂”，学学为父之道。这些都见于他的《热风·随感录二十五》和《坟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，不赘述。

至于“教不严，师之愆”，恐怕就有些众说纷纭，莫衷

一是了。

首先是教的一方对学的一方到底应如何要求，据我所知，主张“从严”者有之，主张“从宽”者亦有之，主张“严宽结合”者自然也有之。道理大概是都能说出一些的。其次，“教”而“不严”，是否都因为“师”之“惰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，即使在复课闹革命时期，又有哪位老师敢冒“管、卡、压”之大不韪，公开主张“从严”呢！

在下解放前即曾任中学教员，解放后先后任中学和大学的教员，匆匆也近四十年了。回想一下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我好象是主张“教”应该“严”的。不过这也许是当老师的一面之词。想当初我也上过私塾，上过小学，上过中学，上过大学，向各式各样的老师执弟子礼，达二十余年之久。当时我的心情又如何呢？好象是喜欢“从宽”的老师。马马虎虎，即可混个及格，快何如哉！对那些严格要求，一丝不苟的老师，倒颇有怨怼之意。

奇怪的是，几十年过后，留下深刻印象，并怀念不已，而且深感受益良多的，却正是那些“严师”。而当时那些“宽师”则几乎全然淡忘。偶有记忆，则又颇恨其当日之不严了。

看来，教还是严些好。不管是接受束修，还是领取工资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，总是老师的职责。教的不严，便应视为失职。

当然，学生也应支持老师的严要求，并首先严格要求自己。《三字经》中，接在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后，还有“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老何为”四句，我看也是有道理的。

1986年5月12日

论两种“苦学”

刚刚听说，当前教学改革的大趋势之一是要变“苦学”为“乐学”。我不禁暗叫一声“不好”，不久前我还在一篇短文里大肆鼓吹“悬梁、刺股、负薪、挂角的那种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的精神”，这不是逆潮流而动了么？

其实，“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”，这道理我是早就知道了的。因此，幼儿园的儿童，小学生，以至中学低年级的有些孩子，贪玩，不喜学，不爱学，不想学，不愿学，也是人情之常，毫不奇怪。如果老师、家长只知一味硬逼着他去学，勉强着他去学，不学，或不好好学，就罚站、罚跪、不给饭吃、打手心、打屁股，老师祭起考试的法宝，家长扬言“将来让你去扫大街”……这样的学，大概的确是“苦矣”了。在下现在虽然提倡“苦学”，回想五、六十年前，也是经历过那个以学习为痛苦的阶段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应变“苦学”为“乐学”，设法引起孩子们学习的兴趣，从而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，自是非常必要。

不过，“苦”字并不仅作“痛苦”解。至少还有“勤劳”一义。而我们常说的什么“刻苦学习”呀，“苦读寒窗”呀，“勤学苦练”呀，等等，其中的“苦”就都是这个意思，不好释为“痛苦地学”、“痛苦地读”、“痛苦地练”的。